

# 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生成的逻辑及应对

◇丁少锋

##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特征表现及其成因

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以中高速度增长,工业化发展深化,人口规模、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有可能达到最大值,有效化解生态风险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表现

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在生态领域,我国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自然风险”),同时还受到全球性现代化生态风险的威胁。

#### 1.生态环境恶化具有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可能性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生态系统越容易失去平衡,生态风险后果就变得越严重。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遭受到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自身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严峻考验。

#### 2.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在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将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减缓并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最终将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首先,资源环境以及作为生产要素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经在我国普遍显现,支持经济发展所需的环境容量已经不足。其次,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将被迫动用更多资源来遏制生态危机的发生,这会加大发展的成本投入。

#### 3.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风险

人类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一方面会使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锐减,最终导

致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极易引发环境灾害事故的发生。这些状况不仅会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 4.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安全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以及其他生物生存环境的恶化。当生态环境问题的威胁变得较为普遍时,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威胁就转化为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威胁,因为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也会对国家主权、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产生各种危害,从而形成国家安全问题。

### (二)中国生态风险的成因

#### 1.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内部成因

首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爆发是现代性负效应的典型表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是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工业化自身的“反自然”性质决定了工业生产必定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中国在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必定会承担自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代价。

其次,不合理和不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生态风险的重要根源。在以往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人们单纯追求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工厂、企业和个人在开发和利用资源时受到的约束较小。在经济结构的优化方面,还存在产业竞争过度、产业结构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不匹配、市场发展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

再者,生态风险意识淡薄是导致环境污染等行为发生的主观原因。一方面,一部分人对生态恶化的现状缺乏了解,对风险的感知不够到位,生态文化教育和公众参与力度不强,致使很多人没有形成正

确的生态观;另一方面,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缺乏效率等因素也不利于生态风险意识的养成。

## 2.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外部成因

从世界环境污染容纳空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世界环境容量相对宽松,无论是环境资源还是环境容纳污染物都少有限制,并且其工业化是以对全球资源的消耗为支撑的。相反,对于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等“后发式”国家来说,既无条件也不允许占有类似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所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这些后发国家面临外部资源环境约束以及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影响来看,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达工业化国家凭借其资本与技术优势,将落后产能与资源消耗型产业不断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致使其处于高生态风险的境地,承担着本来应该由全世界共同分担的资源环境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发生环境安全问题的可能性。

## 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应对生态风险的对策

当前,突发性环境污染和频发性生态灾害事件已经使生态风险成为威胁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严峻的生态风险,根据生态风险发生的规律和趋势,选择适合国情和世情的措施,构建有效的预防与治理机制,防范生态风险大规模发生。

### (一)构建规避生态风险的伦理文化约束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生态问题的发生,首先需要确立环境伦理约束机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人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变革人们先前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建立健全环境伦理约束机制。这种环境伦理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在发展中确立公正理念或原则;树立可持续性观念;确立适度性生产和消费原则。其次要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培养全社会生态行动自觉性。当前普遍存在的生态意识薄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利于有效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因此,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有效解决和科学应对日益严峻的环

境问题,需要通过生态知识教育、环境教育和社会风险与危机教育,培养与提升全民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好“榜样感召”“行为引导”工作。通过风险知识传播向公众普及风险文化,增强生态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能力。

### (二)建立健全生态风险管理体制

生态风险管理体制建设就是创建一种有效规避和治理生态风险的制度和机制,以及时预警可能发生的生态风险,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规避。在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首先,需要建立健全高效的生态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这一方面需要我们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生态风险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机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主体责任等方面进行规范,使我国生态风险评估有规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建立相应的生态风险预警体系,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安全事件及社会风险的发生。此外,在生态风险的治理方面,更需要实现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等超越各自局部利益的更为广泛的合作,防止出现风险责任主体缺位或虚位的局面。只有形成广泛的合作,才能使区域内每一个生态责任主体都受到制约,进而使生态风险能够得到有效预防,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之间多元合作的生态风险治理体制和机制。其次,运用经济手段防控生态风险。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优先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加强执行力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风险商业保险制度。再者,构建科学的生态风险防控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法制监督和管理体系,有利于从源头预防生态风险的发生,同时也能在风险发生后进行有效处理。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生态风险治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风险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完善我国生态风险治理的制度和机制,并在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中展现我们国家生态治理的能力、智慧和决心,最终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丁少锋,信阳师范学院宣传部长,副教授。

(摘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